

# 将饥饿武器化的道德堕落

故意将饥饿用作武器——以控制、胁迫或摧毁平民的意志——是违反人类伦理和国际法的最严重罪行之一。在加沙，这一罪行已被完善为一个系统。所发生的不只是人道主义的失败，而是一个在援助幌子下精心策划的支配计划。这一战略的核心是亚瑟·阿布·沙巴布（Yasser Abu Shabab），一个从罪犯转变为合作者的角色，以及实施了一个军事化的分配制度，这个制度杀害的人比它养活的人多。通过虚假指控、代理战争和对食品获取的致命控制，以色列将人道主义援助转变成了痛苦和屈服的舞台。巴勒斯坦人被引诱到援助车队，却遭到枪击——这种策略即使是对待野生动物也会被认为是无人道的。

## 亚瑟·阿布·沙巴布：从黑社会到代理执行者

亚瑟·阿布·沙巴布的故事不是救赎，而是被占领操纵的机会主义。他曾是加沙犯罪黑社会中的知名人物，因贩毒和武器走私被监禁，直到2023年10月越狱。在随后的混乱中，他以所谓“人民力量”——也称为“反恐服务”——的自封领导者身份重新出现。以色列急于分裂巴勒斯坦的团结并通过间接统治削弱哈马斯，据报道武装并授权阿布·沙巴布的团体在IDF控制的地区行动。

这种关系并不新鲜；殖民强国长期以来依赖道德上妥协的当地人作为外国控制的执行者。但在加沙，这种策略立即引发了强烈的反感。阿布·沙巴布的合作被视为一种如此深重的背叛，以至于他自己的部落和家庭都与他断绝了关系。在一个亲属关系和团结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中，这种公开的拒绝使他成为了被排斥者。他不仅被孤立——他成为了占领试图腐蚀的一切的象征：忠诚、身份、抵抗。他的故事揭示了占领者如何将个人野心转化为社区的毁灭。

## 虚假旗帜与援助的崩溃

以色列对加沙援助系统铁腕控制的理由核心是哈马斯抢劫人道主义物资的指控。这些指控在2024年底浮出水面，被用来否定UNRWA的合法性并切断关键的供应线。然而，可信的报告随后显示，最严重的援助盗窃事件——109辆联合国卡车的抢劫——不是哈马斯所为，而是阿布·沙巴布的部队实施的。尽管如此，这一叙事依然持续，被武器化以拆除现有的援助基础设施，并用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GHF）取而代之，这是一个在2025年5月在以色列和美国支持下建立的军事化机构。

## 亚希亚·辛瓦尔的尸检：进一步反驳以色列的叙事

进一步反驳以色列指控的是哈马斯重要领导人亚希亚·辛瓦尔（Yahya Sinwar）死亡时的状况。以色列自己的验尸官确定，辛瓦尔在死亡前的三天没有进食——这是一个引发严重疑问的细节。如果哈马斯如以色列所称系统性地盗窃援助，他们的领导人不太可能被饿死。这一证据指向了援助分配的更广泛失败，表明物资被其他团体，如阿布·沙巴布的民兵拦截，而不是被哈马斯囤

积。像辛瓦尔这样的关键人物的饥饿凸显了残酷的现实：无论谁控制，援助都没有到达预定的目标。

## 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饥饿游戏变成现实

GHF承诺协调和安全。它提供的却是屠杀。分发点变成了死亡地带。催泪瓦斯、橡胶子弹、实弹和踩踏事件将寻找食物变成了每日的俄罗斯轮盘赌。近800名巴勒斯坦人在试图获取援助时被杀，数千人受伤。这个基于虚假前提建立并通过暴力维持的系统，不仅未能解决饥饿问题——它还将其制度化了。它反映的不是救援的逻辑，而是控制的逻辑：要吃饭，你必须服从；要生存，你必须屈服。

根据国际法，这是一项战争罪。《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54条明确禁止将平民饥饿作为战争手段，包括针对或破坏“平民生存不可或缺的物体”。《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同样将饥饿作为武器的使用定为犯罪。通过拆除可信机构、拒绝援助并在分发点杀害平民，以色列建立了一个完全不是人道主义的体制——它是一把武器。

## 用诱饵猎杀人类：人性的终极低谷

这一系统最令人恐惧的方面或许是它如何颠倒基本的伦理等级。在以色列，如同许多国家，禁止用诱饵猎杀野生动物。这种做法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违反了公平狩猎原则，即使是非人类生物也受到保护，免于不必要的痛苦。然而，在加沙，饥饿的平民在援助的幌子下被引诱到食物旁，却被士兵射杀。对鹿来说被禁止的事情，对儿童却是合法的。

这种伦理颠倒并非偶然。它是去人性化的逻辑终点。当一个民族不再被视为完全的人类，他们的痛苦变成了背景噪音；他们的死亡，变成了行政事务。道德的深渊在战争的迷雾中并未最宽，而是在将生存本身视为占领者分配的特权的政策清晰中最为宽广。加沙的饥民不是附带损害。他们是目标——被引诱、被射杀、被一个赋予动物生命比它饿死的人类更多法律价值的系统抛弃。

## 结论：超越言语的罪行

在加沙将饥饿武器化，由亚瑟·阿布·沙巴布这样的合作者促成，并通过以色列的军事化援助系统制度化，不仅仅是一种战争策略——它是对人类尊严的亵渎。它反映了一种心态：食物成为支配的工具，合作得到奖励，平民因需要吃饭的罪行而被屠杀。人道主义机构被武装看守者取代，将加沙的援助通道变成了死亡通道。

这不仅仅是政策失败。它是反人类罪。最严厉的控诉在于一个本不应需要的比较：动物比加沙的饥饿人口获得了更多的伦理考量。这种怪诞的颠倒要求全球的愤怒——不是作为政治问题，而是作为良知问题。一个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世界，是一个在自由落体中的世界——不仅是道德上的，还有文明上的。